

布琮任(Ronald C. Po)著，陳建元、康海源、楊柳青譯，《藍色邊疆：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4年，375頁。

清史研究往往關心清朝作為陸地政權活動的一面，即使是20年來影響中外學術界甚深的所謂新清史研究，其強調清廷的滿洲特性、清朝是一個統治多族群的帝國、在今日中國西北的軍事行動與治理等，皆是將目光放在了活躍於歐亞大陸內部的遊牧族群。然而清朝除了要控禦廣袤的內陸地區，其領土之上尚有遼闊的海岸線、星羅棋布的島嶼乃至東海、南海，影響清代中國命運的西方列強便是從海上襲來。自鴉片戰爭以降清朝屢屢敗於海上的歷史，反讓後世根深蒂固地認為清朝是一個漠視海洋的陸地強權，實行只允許「一口通商」的閉關鎖國政策。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布琮任的研究專注於清代中國與當時的海洋世界，其2018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專著便是要挑戰傳統過於將清朝視為內陸國家的觀點，指出清朝實際稱得上是一個海洋國家。如今該書在進行修訂的基礎上被翻譯為中文，可以被更多的讀者閱讀到。

作者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指出，本書目的是喚起研究者對清帝國在當時海疆、海事、海洋等方面發展的關注，而且只是倡議清朝並未漠視海疆尚不足夠（頁 xxxi）。本書絕大多數內容並非布琮任別出心裁的全新研究，諸如清代中國的海洋地理環境、清朝的水師與海關，在中外學界皆有相當數量的先行研究，作者對於清代海洋史研究的貢獻不在具體史料解讀或新史料發現這兩項歷史學相當重視的評價標準上。布琮任論述18世紀清代海疆，其背後有相當長時段的思想史或理論關懷，這與絕大多數研究清代海洋史的學者不同。其一便是分析中國古代的海洋觀在進入清朝後如何被概念化，「內」與「外」的關係成為理解海洋空間的關鍵，由此認為二元空間概念成為清廷治理海疆的根基；其二則是釐清歐美學界的「海權」「帝國」等先驗性的現代概念如何影響對於清朝國家性質的判斷，進而形成了清朝作為陸地國家必然無法關注海洋的錯誤認知。布氏在海外接受完整的學術訓練，卻能有批判性意識，在操戈入室地理解歐美學術研究範式的理路後，方能準確把握其得失。第一點讓全書討論的議題與撰寫手法上的謀篇布局極有邏輯性，是層層推進地解決問題而非在「藍色邊疆」的話題下呈現面面俱到的教科書式寫作。至於第二點，則相比於在史料運用、史實解釋上為歐美學術界糾謬，嘗試在學術理路上指出理解清代中國諸多範式的不合理，而正本清源地批評構

築在錯誤概念上的具體史事討論。因此討論本書的寫作與論證，需要了解作者在概念辨析上取得的成果，之後再結合這些抽象的概念評斷具體分析。

作為第一章的〈緒論〉，其中便有相當篇幅呈現了作者本人的概念分析。開宗明義，布琮任便交代了本書的最初寫作動機是探究清朝在海上作戰中被擊敗的原因。然而在19世紀的陰霾以前，清朝在西北地區取得了輝煌的軍事成就。一部分研究認為清朝在海上孱弱的理由，是它本身的性質為一個陸地強權。本書的寫作過程便是為了判明這些觀點的正確與否，同時還原清朝作為海洋國家的地位。在此，布琮任明顯不同意將清朝視為陸地國家的傳統觀點。他認為拒絕把清朝視為海上強權，是因為一種二元對立觀念在作祟，即近代早期的帝國不可能兼有陸地與海洋強權（頁6）。他的反擊之道，是論證清朝的陸上政策與海洋政策密切相關，並且在18世紀時採取了主動介入海洋事務的方針。作者在此對歐美學術界的舊思維鞭辟入裡。後者往往根據來自黑格爾、韋伯創立的意識形態決定論進行推論，即從一個國家文明或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特徵，推斷其政策基於陸地或海洋。既然清朝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的關注重點在陸地，必然會冷落大海，從而由西歐人任意進出中國大陸的周邊海域。然而精神或者意識形態並非推動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頁7）。另一種影響判斷的概念，是19世紀後期馬漢創立的「海權論」。馬漢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取決於對海洋的控制力，而歐美學界過去基本認為中國無需考慮海權，因為陸地強權毫無控制海洋的動機。海權並非單一模式，而且海權理論完全來自歐洲在大航海時代以來進行海上擴張的歷史經驗。獲得海權不意味着一定進行海外侵略（頁15—19）。

本書是為了強調盛清海洋政策內在活力及其海洋意識，闡明清朝在近代早期如何概念化、模式化和管轄海疆。因此第三章對於內外洋觀念的討論在布琮任看來至關重要，藉由這一概念化的海疆方能理解清代君主、地方官、水師等主體的治理邏輯。此外討論清朝的海洋意識，重要的是國家開發利用海域水道採取的行動規模和形式，因為依賴海洋空間，其海洋意識就強烈。海運、海上軍事活動、海洋經濟活動，都有助於形成海洋意識，基於上述的邏輯，本書才重點討論清朝的水師與海關。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本書為理解東亞海洋的深層結構，也就是地理邊界、氣候、地形等建立了相關脈絡背景，這便是第二章所概述的東亞地理環境。清廷一直試圖徹底掌握所控制的海岸線，最終制定了一系列精確的海洋圖冊，比如《海疆洋界形勢全圖》；同時也要把握周邊海域的風向、洋流等影響航海的自然因素（頁42—55）。在了解周邊海域地理環境的基礎上，第

三章透過外在利用、內在認知、呈現方式三個方式討論18世紀清朝海洋空間的形成，即研究海洋如何被概念化的歷史。海域的劃分並非基於自然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塑造的結果，因此作者藉由討論清朝如何命名、建構海洋空間的過程，以說明清廷概念化的海疆，從而分析在海洋空間構想基礎上制定的邊疆治理戰略，以解讀清廷在不同時期的具體政策。清朝皇帝的精力在於治理內海，而不是控制數千里外的海域，並不尋求超越本國海洋空間和外國海洋空間的界限，以謀求開發、控制後者。固然清朝利用各種機制塑造特定的社會建構，主要是在概念化的內海之中行使權力。因此內外模型帶來了清廷海洋政策的侷限，官員致力於收集沿海、東南亞的情況，可是對外海國家的情報掌握有限。相形之下，歐洲國家的思維則是不斷擴展自己所掌握的海洋。19世紀清廷在海上的失敗，被布琮任歸咎於這種內外海洋空間模型。

然而在鴉片戰爭的慘敗之前，清廷就是在內外海的概念構想下塑造的具體政策。第四與第五章所研究的沿海防禦體系與海關衙門，便是在前兩章所討論的海洋空間上的清廷如何行使權力，這涉及海上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布琮任回顧了清初水師的建立，再按照渤海灣、江浙、福建、廣東這一清朝的認知方式區分當時的海疆，研究海域之間的地理差異，討論不同的水師汛防方案。基於對水師發展歷程的回顧，作者認為18世紀的清朝水師一直在維護內海和平，讓清軍得以在西北順利進行軍事行動，而且這一時期清朝在東亞海域的控制力也促進了國內和東南亞海上貿易，同時西歐國家也在這一格局中進行貿易。不過水師並非清廷唯一提供的長期商業保護機制，第五章討論了18世紀清廷重視海洋的另外一個制度——海關。當清廷敏銳意識到經濟發展與帝國穩定之間的密切關係時，便給予部分地方商業精英一定自主權，允許這一群體參與到海關事務中。看似下放權力的舉動，是由於朝廷並不熟悉海運，需要仰賴熟悉海運的地方商人，憑藉後者的專業知識進行決策。布琮任又認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內外海框架以及這一框架與海關之間的聯繫。布琮任注意到乾隆皇帝在1760年代前後對海關的態度有所變化，其背景是在此之前清廷可以大致透過自身的財政收入負擔海關開銷，可是此後伴隨着土地稅收減少與貨幣混亂影響下的經濟危機，清廷逐漸難以負擔海關的費用。為了維持這一制度，朝廷更傾向於向歐洲貨運商徵收費用。對於著名的一口通商，作者在內外海模型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認為扼守長江口的寧波比廣州更靠近北京，同時廣州的經濟重要性強，但是屬於帝國邊陲，因此在內外治理模式下的地緣戰略角度而言不如寧波重要。

在之前的部分中，布琮任所著墨的是清朝的君主和處理海洋事務的地方官員，更多是從權力精英的視角展開。而在第六章中，他聚焦於漫長的18世紀中陳倫炯、王大海、謝清高三位文人的海洋著述，認為其中體現了部分清朝人對海疆自然、文化地理的重視，並且提供了新視角來考察沿海地區影響航運與軍事戰略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至於這三人是否可以代表整個士大夫，布琮任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更傾向將這三人視為中等階層。與16世紀歐洲知識份子改變了將海洋視為阻礙的觀念類似，這三部著述將海洋視為通向各地的跨區域接觸地帶。三位士人不僅提供了新的海外地理信息，也質疑了傳統的天下秩序。遺憾的是，對海洋有興趣的他們沒有力量讓清廷形成應對歐洲人的海洋政策，儘管清廷並非漠不關心海洋。

在本書的結語之中，布琮任繼續重申清廷治理海疆的理念植根於內外海二元空間概念，而這樣的理念至少持續了一個世紀。透過對水師、海關與涉及著述的研究，不應該認為清廷和文人對於海洋漠不關心。接下來研究者更應該投入時間精力去研究清朝面對海洋的方略。當然布琮任承認清廷的首要關切是西北邊疆，他要強調的是強調清廷在將主要精力放在西北的同時，並未忽視藍色邊疆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將清朝排除在「海國」之外的觀點並不成立，這個被認為是陸地強權的王朝，其海洋治理的參與程度比原先認為的更深。清朝並非在鴉片戰爭之後才「開眼看世界」，而是始終關注着海洋以及海洋所通往的異域。若本書僅僅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不能滿足中文學界的期待。本書所關注的清代海洋史具體議題是水師與海關，然而從清廷如何關注海洋並加強控制而言，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忽略楊培娜關於清代漁船編管與漁稅徵收的研究（楊培娜，《生計與制度：明清閩粵濱海社會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這兩個方面是王朝國家權力向海洋延伸的體現，與本書所要着重描述清廷如何控制海洋密切相關。另外布琮任在第五章中一直強調海關是清廷與沿海士紳、商業精英的共謀，並沒有提供一個具體的個案說明作為群體的士紳與商業精英，其代表是誰，又是如何與地方官府、海關機構互動，從而成為清廷建立海關網絡的依仗。第六章僅僅依靠三份文本展開論述固然在先天便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可是布琮任也並未展開說明三位具體的作者的生平與所處的知識環境，同時沒有凸顯在漫長的18世紀的不同時期，三人所處的環境有所改變，特別主要活躍於嘉慶朝的王大逸，其面對的已經是布琮任眼中相對失靈的海疆體系。雖然布琮任自己也沒有擺脫「19世紀的陰影」，在凸顯清廷如何重視海疆之餘又時常在結尾部分批評水師與海關的

結構性缺陷無法應對歐洲人，強調嘉道時期對於海洋管理的調整與內政改革是失敗的。正是在嘉慶一朝，面對華南海盜的侵襲，清廷尤其是兩廣的地方官員在既有模式失效的無奈下透過各種方式調整海洋，最終將為患多時的海盜問題消弭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倘若重新評價傳統上被視為「中衰」的嘉道兩朝，本書或許可以更為有效擺脫19世紀清廷海戰失敗所帶來的「後見之明」。

不過就本書所設立的目標而言，布琮任已經成功讓學界意識到「海上新清史」這一議題的生命力，不管如何對新清史、帝國性、海權等概念提出質疑。更重要的是，本書中文版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得以了解到歐美清史研究背後的理路，單純從史料運用方面對非中文論著進行批評，並無法進行有效的國際學術對話。更應當期待本書的出版，刺激過去二三十年積累大量實證研究的中文學界，開闢在全球史與比較史的脈絡下繼續推進清代海洋史研究的新路途。

趙邁禧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張萌，《流動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場經濟史》，史可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281頁。**

森林和木材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經濟社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缺乏鋼筋混凝土的前現代國家，木材是城市建設和房屋建造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伴隨着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的見世，一批學者對於山場木材的管理和交易做了較為深入的學術研究。本書立足於前輩學者扎實的學術史貢獻，嘗試用更大的視野揭示清代複雜的木材跨區域流動過程。在江南地區的林區逐漸開發殆盡後，中國經濟重心和木材林區分布的地理距離問題尤為突出。長江中下游地區龐大的木材需求，促使一個跨區域的木材貿易結構在中國版圖上徐徐展開。本書力圖展現這一涵蓋木材生產、採伐、運輸、投資、交易、納稅的經濟鏈條，形成從木材角度理解清代市場經濟的新路徑。

本書主體部分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探討「皇木採辦」背後所反映的制度合理化過程。唐宋變革期後，長江下游地區森林儲備大量消耗，但對木材的需求量有增無減，促使木材資源從更廣闊的西南、中南地區向經濟、政治中心進行流動。這種前置性的跨區域木材交易市場，推動明清時期皇木採辦的